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刍议

刘大可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有别于中国史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基本性与主流性、宏观性与整体性、民族性与阶级性、革命性与斗争性等特征,而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了鲜明的理论性与逻辑性,因而发挥着学术与理论的双重价值,具有资政史鉴、理论宣传、思政教育、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对象;方法论与方法;功能定位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1)04-0015-10

一门学科之所以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为独特的研究对象,二为独特的研究方法。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学界有过一定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其学科边界仍然比较模糊,相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with 功能定位也似是而非。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就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with 功能定位略作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研究对象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研究对象最容易混淆的是作为中国史二级学科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通常人们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或被视为大与小的关系,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包含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如果如此,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就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下的三级学科。

但是,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必然不同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而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其独特性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基本性与主流性。所谓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系指中国近现代史最主要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研究。如从鸦片战争以来180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史、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史,正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说:“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①。又如,学术界曾就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基本线索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分别出现过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②、李时岳的“四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0页。

^②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阶梯说”^①、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说”^②、章开沅的“民族运动说”^③，以及“两个过程说”“近代化说”“历史发展的非线性说”等等。进一步延伸到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又有新“三次革命高潮”说和“七次革命高潮”说。所谓新“三次革命高潮”说指的是：陈旭麓认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7年的革命和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应构成新的“三次革命高潮”。“七次革命高潮”说指的是：张海鹏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构成中国近现代史的“七次革命高潮”^④。

再如，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要深入研究、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和重要人物，要注重研究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共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此后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组织管理人才^⑤，被称为“伟大的预演”。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不但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而且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重要文件，又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和林彪等密切相关，是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研究的叠加典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研究的正是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

中共党史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要特别注重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⑥，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开启了当代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因而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要牢牢把握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改革开放史是中共党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用“苦难辉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艰辛探索”来概括，那么改革开放时期用“高歌猛进”来概括则不为过，因为前两个时期的巨大成就背后都有失误、曲折，甚至偏差，而改革开放40年虽非一片坦途，但没有明显的失误且总体上“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因此，改革开放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2、宏观性与整体性。所谓宏观性与整体性，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之间有包含关系。研究中共党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改革开放史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部分，同时中共党史又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一部分。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也是一个整体，“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20多

① 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②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 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④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⑤ 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11月4日），《人民日报》2011年11月5日。

⑥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一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又载中央党校编：《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编印，第252~253页。

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①。

与此类似，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指应将1840年至今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正如毛泽东所说：“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②，关注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总体性的、综合性的、主要的重大问题，而不注重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的细节、微观的实证、局部史实的考辨，更不关注那些割裂整体、过于细化的“碎片化”历史以及琐碎冷僻、无关宏旨的一事之考、一字之辨。如外债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外债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举借外债、利用外资的情况，更不注重具体一笔一笔外债的来龙去脉和数据，而在于通过外债史的考察剖析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达到寻求规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当前的各项建设工作提供参考。又如，研究土地革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不拘泥于研究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制定的具体方针政策，而更关注中共如何动员农民、引导群众运动的方向等。研究古田会议，重在提炼“思想建党筑党基、政治建军铸军魂、群众路线赢民心、敢于斗争得胜利”的古田会议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以国共合作抗日为标志的全国抗战、全民族抗战的八年的历史，还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包括东北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抗战。要把“全面抗战”“全国抗战”，“八年抗战”“十四年抗战”贯通起来统一研究^③。

不仅如此，我们研究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分别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三个历史阶段展开深入研究，但此三者不是相互割裂，而是一脉相承、递进发展的有机整体和清晰的宏观认知。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将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基础，使中国人民站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世纪之交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起来”的特征日益明显，中国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概括，宏观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百年接续奋斗的成就，准确而形象地描绘了百年历史的最重要特征^④。因此，“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犹如春华秋实、一以贯之，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要辩证地、历史地、整体地、宏观地看待这三者的关系。

3、民族性与阶级性。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近现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建立，对应出现民族国家奋起反抗、追求民族独立的步伐。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中华民族赶上世界潮流，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次革命、改革及各种战争、爱国运动、民众斗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不同方式和手段。中国近现代各阶层民众的“民族运动”是兼具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双重要求的混合型运动。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概括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重要视角，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史出现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受到

①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2013年1月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

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③ 邱潇、郑德荣：《“十四年抗战”概念衍生的党史分期问题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4期。

④ 杨凤城：《习近平党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

外来民族的奴役,主权部分丧失、领土遭受割让、财富被洗劫,随之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民族运动的高涨;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则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民族革命的高潮。中华民族经历了征服与反征服的征程,“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我们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我们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最高频率论及的对象之一。民族运动与革命的高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的整体态势,并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给其他国家以支持和鼓舞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②。这些主要矛盾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

4、革命性与斗争性。毛泽东指出:“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③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丰富多彩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阐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重要任务。因而革命性与斗争性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重要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经历了两个重要发展过程: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二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指出:“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④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主线,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应运对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进行整体考察,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两对矛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革命,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⑤。因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对象具有明显的革命性与斗争性特征。

所有这些,围绕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性与主流性、宏观性与整体性、民族性与阶级性、革命性与斗争性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亦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研究对象。

①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一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又载中央党校编:《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第250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

④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页。

⑤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13期。

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与方法

鉴于上述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不同于中国史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亦有别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方法。职是之故，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既要有宏观理论的指导，也要有具体的研究方法。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之上，论从史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等观点，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辩证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点，向人们提供了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武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一门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史料、基本史实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实现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才能进一步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告别革命论”“侵略有功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大有市场，这些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

不仅如此，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研究除了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必须坚持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之外，还需要其自身的学科理论指导。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理论重点在于认识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如何认识的问题，其中心问题是以研究者本身为研究对象，探讨研究者的主体认识与所研究的中国近现代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关于中国近现代史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再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矛盾及其所具有的性质、特点等进行理论探讨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所形成的历史认识，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研究话语系统，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独特性；二是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成果，有哪些存在形式，如何发挥其学术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等。因而，其研究成果当能焕发出学术的魅力、逻辑的魅力和理论宣传的魅力。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①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正是要将其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运用“古今中外法”加以考察，亦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不能拘泥于自身，而应扩大视野，从纵横两个维度加以考察。从纵的维度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从横的维度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还要有世界眼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民族运动与革命的高涨，是世界各民族运动与革命史的一部分，并在世界民族解放运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0页。

动中给其他国家以支持和鼓舞的作用,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放到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在宏观比较中体现中国近现代史演进的独特内涵。

运用逻辑方法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显著特点。所谓逻辑方法,是指采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论形式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最常用的是因果逻辑、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理论论证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逻辑方法对历史事实经过抽象概括,抓住主流与本质,抓住基本方向和基本线索,抓住必然。它反映的历史是“提炼过”的历史,它以理论形式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历史逻辑。有了规律性的知识,就有了通观整个历史过程和全部历史材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线索。人们从这个观点和线索出发,就能区分史料所反映的主流和非主流、本质和非本质,使那些偶然的、曲折的和偏差的历史现象都得到科学的说明,符合理论的逻辑。而这些规律性的认识运用实践,更好地指导实践,“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是把握历史大势、发现历史规律,为当下人的行动指明未来”^①,合于实践逻辑。习近平以社会主义发展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其目的就是要让全体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划分为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六个时间段中的一个完整阶段加以全面论述,这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从而领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具有令人信服的理论逻辑力量。主义合不合国情,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符合实践逻辑。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结论和人民的选择,符合历史的逻辑^②,从而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正如习近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③

当然,逻辑的方法不可能以纯粹的形态单独存在于认识过程,理论论证必须以考察具体事实为基础,否则就变成空洞的理论,失去其认识作用。因此,综合分析的方法仍然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所必需,毛泽东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④,“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⑤其他有关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始于孔门、盛于宋、大盛于清、更盛于近世的考证方法,和西方近代兰克史学提倡的“如实直书”、讲究原始材料、重视档案作用、严格史实评估,以及近年西方史学界盛行的口述史学方法也仍然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所采用,特别是年鉴史学所主张的时段理论、对历史的整体性研究、“科际整合方法”,中国传统史学和兰克史学专注的政治外交史,热衷于重大

① 张江:《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兼论相对主义的历史阐释》,《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严书翰:《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历史观》,《新视野》2020年第4期。

③ 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第1版。

④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⑤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2页。

事件、重要人物为主线的研究思路,更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所注重。前述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重(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特征、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六个时间段的划分、“两个一百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就是生动的例证。换言之,逻辑的方法是渗透了史实描述的历史方法,而不是纯逻辑推演的方法。

三、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功能定位

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在功能定位上显然也有别于中国史领域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第一、资政史鉴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①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研究,把握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近现代以来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加深对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在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

在这些方面,中共党史上具有鲜活的例证。中共之所以能够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迅速创建一支相当规模的人民军队和一系列革命根据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根据地建设好端端的局面所以说丢掉就丢掉,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领导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在吸取党的历史上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内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②。

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积累的思想智慧、经验教训,结合当前的形势与任务,或吸取运用,或作为借鉴,对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改进我们的工作,都大有裨益。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40年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发挥以史为鉴的功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第二、理论宣传的意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和谋求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表现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顽强意志,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

^①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2013年1月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

^② 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11月4日),《人民日报》2011年11月5日。

自强不息的执着追求等^①。但这种历史以往较少进行整体的理论归纳与大众宣传。历史最宝贵、最深沉也最持久的力量是文化。中共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就是这种历史文化。中共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如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以此为主干主线，还有在中共的领导下，以区域性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依托的各种精神，如沂蒙精神、大别山精神、大庆精神和福建的古田会议精神、才溪乡调查精神、龙江精神、厦门精神、晋江精神、“马真”精神、滴水穿石精神、三钢精神，以及以先进典型人物为代表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谷文昌精神、廖俊波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族谱和地方谱系。这些精神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源自中共的革命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框架下，深入开展中共精神族谱及其地方谱系研究，对于彰显中国共产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宣传价值。

又如，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以往很少有人将闽台抗战史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史进行研究，而在闽台关系的探讨中也很少有人对闽台民众合作抗战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框架下，如果海峡两岸学者共同编撰《闽台抗战史》，对于增强两岸民众关于抗战历史的共同认知，充分体现两岸民众休戚与共、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和中华民族勇于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样的《闽台抗战史》，展现了闽台两地同胞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经历与记忆，是中华民族奋斗史上的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既有利于两岸人民铭记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艰辛岁月，又有助于进一步凝聚两岸“一个中国”的共识，增强海峡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的研究与理论梳理，通过学校教育，加大正面宣传的力度，从一代一代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精神、高尚的社会风尚。深刻认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担当的本质内涵，发扬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勇担历史重任。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要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第三、思政教育的功能。习近平指出，思政课教学“涉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思政课教师要有历史视野，“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思政课教师的历史视野中，要有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要有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要有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要有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的奋斗史，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史，要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②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以其野蛮的力量迫使封闭的清政府作出了妥协，国家主权不断丧失，人民遭受蹂躏苦难的程度不断加深。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曾侵略和欺凌过中国，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③。研究中

^①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一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又载中央党校编：《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第248页。

^②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2019年3月18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求是》2020年第17期。

^③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一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又载中央党校编：《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第250页。

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就是要深刻了解中国近现代所经历的屈辱史、苦难史，深刻汲取“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大旗，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国家和民族不断燃起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斗争的崭新阶段。中共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奋起革命，前仆后继，经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又领导人民进入了以实行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从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角度讲，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信心，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二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的过程，重温党在挫折中奋起、浴火重生的苦难辉煌史，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前辈共产党人建树的优良革命传统，从中获得强大精神动力。前者重政治认同，旨在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是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后者重精神陶冶，旨在说明历史蕴涵着宝贵的精神遗产，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①。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不仅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也是青年一代必须学好的“必修课”。2020年6月，习近平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四史”在学科归属上属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对于办好高校思政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意识形态工作的需要。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揭示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规律，其研究命题归根到底都涉及到中国究竟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②。实践证明，由农民阶级进行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封建官僚倡导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改良主义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此证明了社会主义“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为近代以来其他各种政治力量都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唯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才使受尽屈辱、濒临危亡的中国进入历史的新纪元，由此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

^① 杨凤城：《习近平党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一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又载中央党校编：《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第251～252页。

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由此科学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结论^①。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曾构想了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其中提出要修建约16万公里的铁路,把中国沿海、内地、边疆连接起来;修建160万公里的公路,形成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并进入青藏高原;开凿和整修全国水道和运河,建设三峡大坝,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利、电力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大力发展农业、制造业、矿业,等等。孙中山擘画的这个蓝图,当时有的外国记者认为完全是一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的确,在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这些宏大构想是难以实现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顽强奋斗下,孙中山当年描绘的这个蓝图早已实现,中国人民创造的许多成就远远超出了孙中山的设想。在中国大地上,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齐,稻麦遍地香,神舟遨太空,国防更坚强。孙中山致力于建设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实践充分证明,只要道路正确、理论正确、制度正确、文化正确,只要坚定不移、坚忍不拔、坚持不懈、艰苦奋斗,朝着伟大目标持之以恒前进,风雨如磐不动摇,我们的目标也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也一定能够达到^②!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要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就研究实例而言,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系列重大疫情发生与应对策略,总结经验与教训。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疫情应对和当前西方社会疫情防控失当、失策,与当前中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重要问题。由此不难发现,疫情面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全国之力,形成了强大合力,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令世人惊叹,充分体现了中国应对如此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与担当,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反观西方社会,即便一个简单的宵禁令,执行的民众屈指可数;一个戴上口罩的呼吁,响应者也寥寥无几,“封城”禁足更是奢望。一些国家“自由过头”、散漫有余,以至于浪费了疫情防控“窗口期”,造成疫情大流行。分析比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疫情防控、西方社会的疫情防控与当前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我们将更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当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也有其固有的学术功能和文化功能,但这些功能归根到底服从于资政史鉴、理论宣传、思政教育、意识形态工作的功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旨在通过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研究,“用学术讲政治”。“讲政治”是其目的,“用学术”则是其方法、手段和途径。这也是其有别于中国史一级学科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二级学科,而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最本质特征。

(本文作者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福州 350001)

[责任编辑:侯竹青]

^① 王炳林、刘奎:《关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8期。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11日),新华网,2016年11月11日。